

天风阁丛书

泰山 吴伟业 肇公

如夢令

梅村词

詞譜

周易占卜人病馬子王陽詩稿報道舊居傳頌尚存
此身猶在休論又是一時家間事

吳 伟 业

撰



天风阁丛书

夏承焘主编

梅村词

〔清〕吴伟业撰

李少雍校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装帧设计 曹辛之
封面题字 吴鹫山
责任编辑 刘焜炀

天风阁丛书
梅村词
夏承焘主编
李少雍校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375印张 2插页 140,000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,780册
书号10111·1396 定价1.40元

内 容 介 绍

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，字骏公，号梅村。本书收编他的词作一百〇六首，命名为「梅村词」。

本书以清朝顺治年间刻本「梅村集」二十卷为底本，并参照康熙年间刻本「梅村集」、「名家词抄」、「百名家词抄」，乾隆年间刻本「吴诗集览」，嘉庆年间抄本「吴梅村先生诗集」、「吴梅村先生诗集笺注」，光緒年间抄本「吴梅村诗笺」、刊本「梅村词」、「吴诗校正」，以及宣统年间石印本「吴梅村词」、刊本「梅村家藏稿」等，逐一进行校勘和补遗，力求比较全面、完整地反映梅村词的面貌。

为了有助于读者对吴梅村其人其词的了解和研究，本书收进有关吴梅村及其词作的图版六幅，并辑录了前人撰写的有关吴梅村的行状、墓表、传记、集序、世系、年谱以及评论文字等多篇。另有校勘者对吴梅村其人其词的综合论述。

序

词起于乐语，妙重声情。分簪诗坛，蔚为大国。昉自隋唐之滥觞，五代之蕃衍，花实递荣，遂极盛于两宋。元明以降，势渐陵夷。而入清复振，号为中兴。千三百年间，才人辈出，佳作如林。其持性情、系人文、资美育而可借鉴者甚巨。如何整理、发扬此项珍贵遗产，以适应文化高潮之勃兴，贊醱迪薰，使之成为文苑百花中耀目之一丛，则有待于吾人之努力。

顾词学之研究，向较冷落；词籍之整理，尤多阙如。明季毛晋以后，丛刻渐兴，读者称便。诸如《宋六十家词》、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、《灵鵠阁刻词》、《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》、《彊村丛书》，号称五大丛刻。搜采既广，辨审多精，至今赖之。然皆限自宋元，毋及后世。近人陈乃乾先生始倡为《清名家词》，叶遐庵先生复编辑《全清词钞》，筚路蓝缕，厥功甚伟。然或成书匆遽，校勘略疏；或囿于体制，存词过少。

治词学者，尚有慊焉。

有清一代，词学昌隆，流派间出，争妍竞奇，蔚成壮观；而论词之作，亦复层见迭出，中人既深，影响亦巨。且时代相承，去今未远，波澜消息，曲曲相通。鉴古酌今，尤有意义。

承焘近年养病北上，卜居京门。鬓丝病榻之畔，药灶茶烟之旁，时有二三友好，风雨过从，议论纵横，而所及无非词者。因思裒集清人词籍，稍加理董，试为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、《彊村丛书》之继。乃不揣浅陋，与周笃文、冯统一、吴无闻诸同志粗定凡例，并约请诸词友择别善本，分题校雠。以词家传略、前人序跋、评介，辑附于后，以为知人论世之助，而名之曰《天风阁丛书》云。承焘年耄，体力日衰，其间纰漏谬误，定必不少。甚盼并世通人，有以锡正。

夏承焘序于天风阁，时年八十有三。

天风阁丛书凡例

一近世词家丛刻，如毛晋《宋六十家词》，王鹏运《四印斋所刻词》，江标《灵鹣阁刻词》，吴昌绶《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》，朱孝臧《疆村丛书》诸大名刻，皆止于宋元，而不及明清两代。是编之选，拟补苴阙略，搜集有清以来重要词家之词集予以整理，为治词者提供一较周备之校本。

一本丛书由夏承焘主编，并约请有关专家、学者和专业工作者分题担任校理工作。
一择别善本、足本为底本。

一凡有价值、有影响之版本，尤其是作者生前稿本、手定本和门人、后人校订本，以及同时代较有影响之选本，一律入校。

一有关词之标点，大体依据《词律》。叶韵处用「。」号；句用「，」号；逗用「、」号。个别词中，斟酌文意，间亦采用「；」号；「？」号；「！」号。

一有关校勘工作：逐字校下，凡与底本有出入处，均记于校文，以存各本之真。校文位于每首词之后。

一凡底本所无，以其他校本补入之词作及存疑词等，列于集后，并于词后注明出处。

一底本中有缺字，用「□」号标出，存底本之真，以他本校字列于校文。

一每集前，有作者、作品介绍及简评文字。集后，有校读记。

一凡正史本传、集评、本事、年谱及有关论述资料，附录集后。

吴无闻执笔

梅村词总目

吴伟业和《梅村词》	李少雍 (一)
图版	(二三)
梅村词校勘	(二九)
附录一 行状 墓表 传记	(九七)
附录二 辑序	(一一一)
附录三 世系 年谱	(一一七)
附录四 辑评	(一六六)
校读记	(一九二)

吴伟业和《梅村词》

李少雍

吴伟业（一六〇九——一六七一），字骏公，晚号梅村，太仓（今江苏省太仓县）人。祖籍河南（今河南省洛阳县）。七世祖元末避兵乱，迁居昆山（今江苏省昆山县）。祖因家贫出赘，才在太仓定居下来。

他的五世祖、高祖和曾祖，都做过官。可是到了他祖父一辈，这个三世仕宦的家庭便中落了。他的父亲只得靠教私塾维持生活。吴伟业就出身在这样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里。

他七岁开始读书。尽管体弱多病，但资质聪颖过人。八岁时，就被他后来的房师、天启进士李太虚称为「奇才」。十四岁，得到复社领袖张溥的叹赏，被特邀至张家受业。崇祯辛未（一六三一），他才二十三岁，「便一举考中进士」，联捷会元、鼎甲。当时吴伟业尚未婚娶，崇祯帝「特撤金莲宝烛，花币冠带，赐归里第完姻」。据说他是自洪武开科状元花纶之后第二个荣受这种恩宠的人（郑方坤著《国朝名家诗抄小传》卷一）。

但是，这种年少朱衣、春风得意的日子只不过昙花一现，他很快就被卷进了激烈党争的旋涡，开始了「无一刻不历艰难，无一境不尝辛苦」（《与子曝疏》）的忧危生涯。事实上，他博取会试

第一名的过程，就已经是一次包含极大风险和危机的经历。陆世仪《复社纪略》载：「是科，延儒欲收罗名宿，密嘱诸分房，于呈卷之前，取中试封号，窃相窥伺。明睿（按即李太虚）头卷即伟业也。延儒喜其为禹玉之子，明睿亦知为旧交之子。伟业由此得冠多士。乌程之党薛国观泄其事于朝。御史袁鼎将具疏参论。延儒因以会元卷进呈御览。庄烈帝批其卷曰：『正在博雅，足式诡靡。』而后人言始息。」在当时，考试作弊，不仅考官要处斩，应考者也有丧生的危险。可以说，吴伟业「获元」（得会元）之日，正是他极可能「丧元」（掉脑袋）之时。他自然是在危机之后才知道此事的。回首既往，真令人不寒而栗。所以他在《与子暻疏》里说，「榜下即多危疑」。是的，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在潜伏着危机，就同忧患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吴伟业刚中榜眼，入翰林，张溥就把一份由同乡诸子起草、揭发奸官温体仁的奏疏交给他，要他上奏弹劾。虽然是初出茅庐，未练朝局，但他觉得「难拒师命」，于是「取参考体仁疏增损之，改坐奕琛」（《复社纪略》）。蔡奕琛是温体仁心腹。而温体仁是复社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。这就是说，他刚走上仕途，便被推到了与明末封建中央政权内黑暗腐败势力斗争的前线。

归娶三年后，吴伟业入朝，任实录纂修官。正值温体仁柄政，只有他与同年进士杨廷麟等三人坚决不入其党，挺立无所依附。温体仁罢官后，杨嗣昌、姚明恭相继入相，「先生皆与之连」（顾渭《行状》）。温体仁同党张至发柄国，传体仁衣钵，并为其歌功颂德。吴伟业为此写了他作官后的第

一篇奏疏。《疏》中说：「体仁性阴险，学无经术，狎暱小人，继之者正宜力变所为，乃转称其美，势必因私踵陋，尽袭前人所为，将公忠正直之风何以复见，海宇祸患何日得平？」（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九）言辞激烈，「直声动朝右」（顾渭《行状》）。接着，他又与同年杨士聪弹劾吏部尚书田惟嘉、太仆寺卿史蘷。田、史同党张至发等切齿怀恨，图谋借事连坐吴伟业。由于他这时奉命去禹州封藩，加之史蘷瘐死牢户，才得免遭祸殃。封藩后，他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。刚过三天，传来了耿介正直的黄道周（当时已遭谪降）因弹劾杨嗣昌而受廷杖的消息。吴伟业派他的一个学生上京申冤，「干圣怒，严旨责问主使，先生几不免」（顾渭《行状》），可是他又以偶然原因免了一场杀身之祸。随后晋中允谕德、庶子，但他却绝意仕进，弃官家居。崇祯十七年（一六四〇），当他在家乡听到庄烈帝自缢于万寿山的消息时，他「号恸欲自缢，为家人所觉，朱太淑人抱持泣曰，『儿死，其如老人何』，乃已」（顾渭《行状》）。福王时，召拜少詹事，入朝两月，因与马士英、阮大铖奸党不合，他便请假归里。

从复社成立直到南明王朝时，复社案象一个可怕的幽灵威胁着他。温体仁、张至发及马士英、阮大铖奸党，多次要利用此案残害正直的知识分子。甚至在南明王朝偏安一隅、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候，他们仍然疯狂地迫害复社领袖人物，并准备逮捕吴伟业。据杨彝《复社事实》载，阮大铖曾向马士英说：「孔门弟子三千，而维斗等聚徒至万，不反何待？」他们甚至准备沿大江陈兵，以为

防御。他们「心知无是事，而意在尽杀复社之主盟者」。复社之所以如此壮大，同吴伟业的名声、学问有很大关系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以要聚集在张溥周围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教出了一个摄取大魁的学生，而且吴伟业又曾多次与奸党直接交锋，因此他特别为世人所瞩目。直至他从南京拂衣归里之后，尽管「闭门不通人物」，然而「每东南有一狱，长虑收者在门，及诗祸史祸，惴惴莫保，十年危疑」（《与子曝疏》）。他的复社战友先后蒙难，而他自己却多次地以偶然原因独免于祸。别人都认为是大幸，可是他自己却认为是最大的不幸，认为自己是「天下大苦人」（《与子曝疏》）。情况的确就是这样。要是他死于复社案，就不至于后来失身变节、遗恨千古的。

南明政权灭亡后，他本来以为从此党祸消除，危惧忧患的岁月已经过去，可以过一段「贫贱安亲，诗书养志」（《沁园春·云间张青蜩从中州南还索词寿母》）的悠闲生活。但是，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「以汉治汉」的政策，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政府，而吴伟业学富才高，誉满天下，因此受到地方官一次又一次的荐举，特别是「老亲惧祸，流涕催装」，他既没有勇气抗拒征召，更不忍伤害父母之心，断绝骨肉之情，他于是流涕登车，扶病入都，在人生途中跨出了追悔莫及、「万古惭愧」、「为后世儒者所笑」（《与子曝疏》）的可耻的一步。入都后，授秘书院侍讲、国子监祭酒。在京三年间，他愧悔交集，抑郁无欢，经常患病，不能视事。顺治十四年（一六五七），他因嗣母之丧南还（这时他四十九岁）。此后十余年，他一直家居，未再出仕。其间，除奏销等案（参

见顾师轼《年谱》）先后威胁着他以外，最大的痛苦就是精神的折磨。他羞愧悔恨，自怨自艾，往者不可谏，来者亦不可追。他这个时期的诗文，一再反复地表达了这种无法排遣的苦闷情绪，可以说是一个由于思想性格软弱而被迫做了「贰臣」的人的一部心史。

明末清初，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为尖锐的时期。吴伟业在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剧烈事变中，表现了复杂矛盾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。

他对明末腐朽政治和黑暗势力很不满，曾多次与之斗争，并因此长期受到身亡家破的威胁。他在不少诗篇中指斥鱼肉人民的虎官狼吏，同情被压迫者在乱离中的种种苦难。但是，他对崇祯帝有很深的感情，反对农民起义，诬蔑农民革命军。

他十分景仰坚决抗清或不与清朝统治者为伍的人的高风亮节。可是，他虽心向往之，然不能至，没有勇气效法抗清英雄和遗民们的榜样，脱屣妻孥，以身殉国。正当他徘徊、动摇之际，清朝政府的多次荐征，年老双亲的悲痛的眼泪，逼使他失足走上了屈辱之路。尽管他因自己的失身而感到死后无面目见庄烈帝及复社诸死难君子，但是对于在他生病时「抚慰备至」、「亲赐丸药」（《与子暎疏》）的清世祖，他并无恶感，甚至流露出某种受恩之情。

吴伟业思想上这种矛盾与软弱性，是同他的家世、教养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。

从他的五世祖起，三世仕宦，逐渐形成了「以礼自律，言行不苟」（顾师轼《世系》）的儒教家

风。他的父亲约斋公以经行称乡里，曾被太仓州守遴选之为年高德劭的「娄东七老」之一，受到特殊的礼遇。他自称「吾于言动，尺寸不敢有所逾越」（《与子曝疏》），也是循规蹈矩、严守儒家教条的人。他少年时读书，也不象当时一般读书人那样「崇尚俗学」，而是「独好三史」，被张溥引为同道。他的老师张溥、李太虚以及他周围的同学、朋友、复社诸同志，都是不满黑暗现实、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。由于这许多方面比较积极的影响，所以在同奸党的斗争中，他能表现出较一般世俗官僚为高的思想境界。

但是，儒学世家对他的消极影响却很深。尽管人民惨遭汉族贪官污吏和满族统治者的欺压、蹂躏的现实，常常激起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，而农民起义，却是同儒家忠、孝思想若冰炭之不相容。他在《绥寇纪略》一书里诬蔑起义军是「盗贼」，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许多歪曲的记载。对于崇祯帝之死，他如丧考妣，痛不欲生。他在许多诗文里流露或直接抒写了对崇祯的深深怀念。可是他后来竟然陷入身仕二主、自感「无面目以见烈皇帝」（《与子曝疏》）于九泉的境地。我认为，这不仅是他的软弱性格所致，而归根结底是他的儒家「孝道」思想起了作用。他在《与子曝疏》中一开始便说：「余少多疾病，两亲护惜，十五六不知门外事。」由于年幼多病，受到父母的「护惜」就特别地多。「孝」对他来说，不是一条抽象的理论原则，而是非常具体的对父母的爱，对父爱母爱的报答。他的诗文里有许多表现这种感情的作品。《王母周太安人墓志铭》里有这样一段：「当吾父之

有声场屋，屡试不收，而祖母汤淑人已老，家贫无以为养，吾母为余言之而泣。余幸弋一第，窃喜有以慰母，而终有憾于吾父之不遇也。」寻常吐属，自然流露了对祖母、父亲、母亲的十分深挚笃厚的感情。他在去世前不久写《与子暉疏》，还以孝道未尽而自责说：「吾于孝道未能克尽，葬事又未完，深负罪衍。」他在《疏》中告诫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克尽孝道。在儒家的忠孝之道中，「孝」之于人，要比「忠」具体得多，切近得多。而吴伟业在父母的怀抱提携中生活的时间相当长，对于父母之爱有着特别深切的感受。对他来说，尊养老亲、克尽孝道，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，都是一条铁的定律。当父母流涕催装，要他应征入京，忠孝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，他经过极端痛苦的思想斗争，最后作出了克尽孝道的选择。

吴伟业不仅对父母如此，而且对兄弟、子女、朋友，都有着非常笃深的感情。只要读一读他的《别孚令弟》、《亡女权厝志》、《哭苍雪法师》等诗文，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。他的作品特多兴亡之感和身世慨叹。他是一个富于感情、深于感情的人。一般诗人常有的那种多愁善感的精神特征，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。他在《与子暉疏》中说：「吾一生遭际，万事忧危，无一刻不历艰难，无一境不尝辛苦。」他自称是「天下大苦人」。有时我们感到，他哀叹身世似乎有些夸大其辞。但这不是他有意识地夸张，而是他这种感觉敏锐、容易忧伤的人的真实感受。大约由于他体弱多病，「十五六不知门外事」，因而性情抑郁，容易伤感；而过度的忧虑，又使他更加衰病，他的多愁善感的个

性因而也就更加发展。因此可以说，吴伟业是一个相当赋有诗人气质的人。

他的一生的确很不幸。前大半生在忧惧疑惑中度过，又在惭愧怨悔中度过了最后十余年。「愤怒出诗人」，各种异于寻常的感情，大约都有助于诗兴。吴伟业的精神上的种种痛苦，成了他的诗歌创作。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，再三再四地忏悔、自责，对于研究一个不情愿地做了贰臣的人的内心活动的历程，更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料。因此也可以说，他生活上的不幸，是他创作上的大幸，他的一生是特别富于诗意图因而也就有助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功。

吴伟业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人。除诗文外，他还写了传奇《秣陵春》，杂剧《通天台》、《临春阁》，以及《绥寇纪略》、《春秋氏族志》、《春秋地理志》等著作。其中，以他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。据《家藏稿》载，有一千余首。他是当时的诗坛领袖，为诗界所宗仰。他的诗歌反映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现实，特别是直接叙写了明末清初的时事，被誉为「诗史」，同时也抒发了个人的身世感慨，尤其是失身后长期愧恨苦闷的复杂情绪。他的诗各体兼工，而以歌行（特别是七言歌行）一体最负盛名，成就也最突出。

吴伟业以诗名，而不以词名。从数量上说，他的词现存一〇五首，不到诗的十分之一。但是，梅村词不仅因其处于词史上一个特殊时期而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他的词作本身也是有相当成就和特